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2.012

融媒体时代技术图像符号的认知失真研究

张 翥¹,周海宁²

(1.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2.山东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济南 250014)

摘要:在融媒体时代,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更新,技术图像符号已经成为了主导性的媒介符号。这种图像符号的普及,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认知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现象——认知失真,即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出现了扭曲。在当今的媒介化社会中,这种现象表现为一种新型的“文盲”——区别于传统的文字文盲,这是一种后文字文盲现象。具体来说,认知失真的表现主要是图像的遮蔽功能过于突出,人们沉浸在图像构建的世界中而不自知。认知失真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技术图像本质的理解不足,以及无法识别不同媒介所带来的认知差异。这种失真带来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它阻碍了自律性主体的构建,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并且强化了图像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因此,我们需要对认知失真有更深刻的认识,重新理解和认知技术图像,明确如何正确使用媒介,并回归到我们原初的学习能力上。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个图像化的世界,避免认知失真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技术图像符号;认知失真;后文字文盲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2-0089-08

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又被称为媒介融合,是指不同媒介间边界的消失,但同时边界的消失又带来媒介的再生成,也就是说,所有的媒介融合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再媒介化,即一种媒介的显现是为了补救另一种媒介。融媒体是利用网络技术赋能而使万物皆媒,形成以场景为核心,以媒介形态为场景入口的新型媒介形态^{[1]39}。换言之,融媒体时代是通过媒介技术的赋能,形成的以场景符号为中介所建构的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新媒介生态时代,亦是“元宇宙”时代媒介的物质性与人化媒介的前提^[2]。而场景一词则与《景观社会》中所提出的“景观”概念同源^{[3]1}。换言之,以视觉图像符号所建构的社会不同于以文字文本符号所建构的社会,因为从媒介技术论的逻辑出发,媒介与人的相关关系产生了相应的价值与影响,而这正是媒介技术的本质所在^{[4]49}。文字符号以抽象性和联想性为特征,因而文字符号更多唤醒读者丰富的联想和多义性的体验,并且有助于读者深刻地解读对象世界,所以文字时代的读者更具理性和严肃性。图像符号更具直观性和形象

性,图像的功能在于将文字的深刻性具体化和直观化,所以在技术图像时代大众更具感性和娱乐性。进入融媒体时代之后,图像(影像)成为人们日常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以移动短视频为中心传播方式的流行表明,新的信息主体登场开启万人共同参与的影像传播文化新时代,这体现了感性时代用户的需求^[5]。但是从受众的视角来看,融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赋能使视觉传播进一步发生偏向,受众倾向于沉溺在图像所带来的感性愉悦中,进而无法识别图像所遮蔽的本质,最终认知失真现象呈现加速化趋势。

一、问题的提出:认知失真研究的正当性

认知失真(cognitive distortion)又称为认知扭曲^[6],表明了个体对现实的感知不准确,如媒介的使用者沉浸在媒介时空中,沉溺于寻求并获得满足的感性愉悦中^{[7]54},进而生活在一种日用而不自知的状态中。从媒介素养的角度来说,媒介的使用者能够利用媒介进行基本的信息获取和传

收稿日期:2023-09-14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全球风险社会视域下网络空间治理的社会舆情引导研究”(22CXWJ01)

作者简介:张翥(1988—),女,辽宁庄河人,文学硕士,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周海宁(1985—),男,山东荣成人,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

达,但同时也沉浸在媒介所造就的媒介环境中,从而无法认知媒介本质,无法看破媒介技术对人的反向控制,进而成为媒介的附庸,导致人的异化,甚至文化危机的出现。特别是2016年之后,随着抖音等移动短视频平台的迅速崛起,一种新的“媒介人”正在建构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视觉文化。这种新媒介人完美地适应了新媒介所造就的新环境——“碎片化的阅读环境”,进而将自身建构为“碎片化的人”。但是,不同的媒介环境造就了受众不同的媒介认知与媒介行动。在融媒体时代,所谓的认知失真可以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去考察,即新媒介所造就的认知可以被归纳为“碎片化的认知”,所以碎片化的认知成为该时代具有统治地位的认知便有了正当性,但对传统的以文字符号为代表的“深度阅读能力”所形成的认知能力——批判性认知能力的轻视则是认知失真的原因。因此,研究融媒体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媒介——技术图像的认知失真便具有了正当性与重要性。

具体而言,对于认知失真的研究,新闻传播学大多聚焦于“舆论”问题研究,即网民认知的失真。对于网民认知失真的成因按观点来区分,其一是网民认知会受到关注事件热度的影响,即“随着某一热点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网民会自觉不自觉地出现认知夸大的倾向,导致集体性的认知失真、反应过度”^[8]。这指出了集体性认知失真的现象却没有指明其本质。其二是网民具有从众特性,即“一种舆论倾向一经形成,往往会急速传导和扩散,造成大的声势,继而进一步强化跟风效应,导致集体性的认知失真、反应过度,至于议论的事实是否清楚、判断是否正确,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甚至谣言也会被信以为真、反复传播”^[9]。该研究指出了谣言的反复传播,造成了集体性认知失真,却没有指明不是事实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是事实的出现更加困难,这是“后真相”的本质。其三是受众容易被情感裹挟,即“越是负面新闻、负面事件、负面话题越能受到关注,越是反主流、反权威、反体制的声音越能赢得喝彩”^[10],强调了情感传播的强势出现,呼吁正确认知形成的重要性,但是如何纠偏失真的认知却没有形成相应实施路径。同时,心理学研究也对认知失真的纠偏提出了相应的看法。认为认知失真的纠偏在于使无意识意识化,即“认知失真具有无意识性、自动性、功能性,所以克服认知失真首先要使

无意识意识化”^[11],那么改善的方法则是通过认知重构来纠偏认知失真,即帮助其认识到头脑当中不现实的、不合理的、错误的、扭曲的认知失真的感觉,从而重构合理的思维方式。

上述研究通过认知失真的成因以及个人认知纠偏等为认知失真提供了学理性贡献。研究主要从人的主体性角度以及媒介本体角度分析认知失真的成因,但是以上考察无法进一步深入揭示现象所遮蔽的部分。所以,本文立足于融媒体时代的视觉文化现象,揭示认知失真的现象,即从媒介与人相关关系的角度出发,探索文字时代与后文字时代(后文字时代是指数字符号超越文字符号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符号,并且图像媒介成为新的记录载体,所以也称为技术图像时代。)媒介本体属性的不同,以进行认知纠偏。具体而言,本文探索文字时代和后文字时代媒介属性的变化造成的各自所属“文盲”的不同特性,指出认知失真现象与本质,并分析认知失真所引发的问题,从而为遏制认知失真、重新建构融媒体时代人类主体性提供理论依据。

二、后文字文盲现象:认知失真的表现

在融媒体时代,视觉性媒介所具有的技术文化意义使传统的视觉文化发生了现代性转向。如果说以电视为中心的视觉文化是对以文字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的超越,那么也就可以说以互联网为中心的视觉文化则是对以电视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的再次超越。

传统的电视传媒时代,信息的生产方式可以表达为专业化的大众传媒组织以舆论生成为目标,对受众进行单方向的信息传达,即从信息传递观的角度来看,受众只是信息传递终端的一个视觉性信息的接收者,或者称之为“旁观者”;而融媒体时代,以互联网媒介为中心的社交媒体平台发展,凸显为新的信息生产技术带来了新的信息生产方式的转换,即受众作为传受一体的信息生产、传达、接收的主体,改变了原来的“旁观者”的身份,而以“参与者”的身份开始建构新型的信息关系生态。例如,国内哔哩哔哩网站上“弹幕”等交互功能的开启,为受众带来了新的参与式文化景观。国外流行的移动平台“YouTube”,将其宗旨表述为我们的使命是为每个人提供发声的平台和观察世界的窗口。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权利,如果我们彼此倾听、分享并利用我们的故事

建设自己的社区(共同体),这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就超越了单纯的信息传递观。那么从信息的“仪式观”的角度^[12],即从共同分享、共同参与、共同体意识、共同价值认同的角度,在言论、信息、机会、归属、自由的基础上,受众以信息参与者的身份便推动了新媒体时代视觉文化的转向。

在融媒体时代,传统电视媒介受众的兴趣点逐渐地转移到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上来,数字化媒介技术不但扩张了传统视觉媒介所承载的信息与娱乐,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认知和实践的整个领域。融媒体时代的媒介使用者看似由传统电视时代的旁观者转变为新媒体时代的参与者,受众仿佛克服了媒介技术的异化,成为一个新造的自律性主体,能够能动地参与到由技术图像所建构的新的媒介生态中。特别是新的媒介生态所带来的媒介经济的新生态——以网红经济、粉丝经济为中心的注意力经济造就着各种看似多样化却又大同小异的文化奇观。但是在技术图像所建构的图像世界中,一种认知失真的状况正在畸形地发展:以互联网为中心的视觉文化并不是单纯地对传统电视媒介文化进行反抗,而是在电视视觉文化延长线上的一种延续性存在。如果说在文字文本时代,不进行文字习得便无法解读文字而成为文盲,那么文字时代之后,媒介技术的发展促进照片、电影、电脑动画以及如今的互联网等媒介的依次迭代升级,并生成新的视觉文化,但后文字时代的文盲现象也伴随出现,即后文字文盲现象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传统文字时代的文字文盲与技术图像时代后文字文盲的最大不同点在于,文字文盲是不能掌握文字的解读能力,而后文字文盲则潜意识地认为技术图像不用习得便可以完全理解,这是图像“欺瞒”(遮蔽功能)的重要表现,并且图像的欺瞒伴生着主体的沉浸性。虽然融媒体的沉浸性扩张了人们数字化生存的能力,同时也扩张了人的属性,即人们由单纯的自然人升级为数字化存在^[13],但是这带来了人们去社会化的隐患。也就是说,数字新媒体使人重新部落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的自由和解放^[14]。其原因在于,人们沉浸在融媒体所建构的虚拟化情境之中,造成了人本身的媒介化和技术化,即造成了人的去社会化现象——人与人的关系被人与技术甚至技术与技术的关系所遮蔽。换言之,这是马克思所言“异化”劳动在融媒体时代的新变形。而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使用者无法看破图像的

欺瞒,其后果便是造成认知失真的日益加速,因为媒介技术的迭代速度超越人类认知的更新速度。

数字哲学家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断言,在未来技术图像主导的时代,文盲将呈现新的姿态,此时,文盲几乎能够参与到影像编码的文化中。如果未来文本完全附属于影像,那时我们会面对普遍的文盲状态,“只有少数专家学习过书写”^[14]⁵²。这就是说,在技术图像符号的主宰之下文盲有了新的意义。文字时代的文盲是被排除在文字符号所构建的文化之外,而后文字文盲几乎可以完全参与到以图像符号为中心的技术图像文化中。技术图像是指机械复制时代之后,从照片的发明开始,以技术媒介为中心的复制性图像开始影响人们的视觉感官,从而使人们获得了与口传文化、读写文化时代所不同的文化体验。图像与世界的关系历经了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模仿说,再经过机械复制时代(本雅明)的再现说,进入了鲍德里亚时代的拟象说^[15]¹⁵⁸⁻¹⁷⁰。换言之,图像本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是流动的。从柏拉图时代的图像是对客观世界的描写,到本雅明时期图像是对客观世界的复制,到鲍德里亚时代图像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彻底消解,即生成了一种比现实更为真实的虚拟现实,也就是说,在虚拟现实更多的可能性能够被创造出来。但是,在融媒体时代,专家是受到过写作训练的人,也就是强调了文字解读能力在图像时代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也就同时强调了在融媒体时代完善的人应该同时具备文字解读和技术图像解读能力。弗卢塞尔将后文字文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通过分析技术图像这一媒介对后文字文盲现象进行解读,因而理解技术图像时代认知失真的成因就具有了关键意义。

三、技术图像本质的遮蔽:认知失真的成因

首先,对认知失真成因的分析,需要理解技术图像的本质。弗卢塞尔将人类传播的历史从符号学的角度进行了三分,即以平面(传统图像:绘画)符号为中介的前历史时期,以文本符号为中介的历史时期,以及以新平面(技术图像)符号为中介的后历史时期^[16]⁴⁵。弗卢塞尔指出,15世纪之后,西方线性文字符号追求的是理性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意识形态,其结果是文字符号的不透明性(专业性与抽象性)造成文本的不可解读性

(在工具理性和合理性的支配下,人们逐渐束缚于书籍所堆砌的壁垒之中),最终束缚了人类的想象能力^{[17]序言14}。例如,对卡夫卡的意识流小说以及科学的理论等,人们大多仅仅了解其形式与名字的存在,而对其内容却根本无法理解,这说明文字理性造就了一种不透明性,人类的历史进入了危急时刻。也就是说,符号中介在人类与客观对象之中并没有起到“桥梁”的联通作用,而是形成一种“深渊”,通过异化作用而造成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变化,导致文化危机的出现^{[18]11}。于是,为了摆脱危机,20世纪之后,随着复制技术的迭代,照片、电影、电视节目、电脑动画以及如今以互联网媒介为中心形成的各种视觉媒介相继登场,在新媒介技术的辅助下,一种新平面——技术性平面符号便诞生了,人类传播进入了技术图像时代。如果说传统的二维图像是对客观世界进行的场景模仿,那么技术图像并非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而是对概念的解释。换言之,技术图像不是将客观世界设定为标准、真理从而进行模仿,而是文本符号的象征,技术图像的根源并非来源于现实世界,而是源自概念。例如,电影是台词剧本的技术图像,交通信号灯是交通规则(文本命令)的技术图像。因此,只有对技术图像本质的遮蔽进行解蔽才能理解认知失真的成因。

其次,对认知失真的成因的分析,需要理解不同媒介所带来的认知差异。尼尔·波兹曼断言“童年的消逝”源自于电子文化的出现^{[19]1},因为读图需要直观、感性的能力,而识字需要的是具象、理性的能力。儿童与成人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文字解读能力,而电子时代图书的真正本质不在于原本文字著述所呈现的理性信息,而在于那些新奇、精美、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壁垒是通过文字建构起来的,从而保障了成人世界的秘密以及尊严。但是现在的儿童在识字之前便能从视频之中进行学习,甚至比成人的图像学习能力更具有天分,从而消解了儿童与成人之间人为刻画的界限。于是,在技术图像时代图像的位阶上升到文字之上,文字仿佛成为图像的辅助性说明。技术图像时代是图像占据主因的文化时代^{[15]179}。那么在技术图像时代,人们的识字书写能力和读图能力仿佛是存在着这样一幅图景:在学校教育之中,人们通过书写能力的学习摆脱了文字型文盲的束缚;仿佛所有的人们在无意识之中,都具备了刻画图像并对其进行解读

的能力。在以互联网媒介为中心的融媒体时代,在技术图像的包围中,人们并不知道信息是如何被符号化的,因为人们并不像掌握文字解读能力一样对图像的解读进行学习,并认为图像是不需要学习的。例如,从儿童的成长便可以看出,儿童通过视觉来阅读图像并不费力,甚至其解读能力仿佛超越了成人。于是,人们甚至相信自己天生可以理解照片和电影,能够对电视节目进行批判性解读,但是这是一种以错误的认知为前提的假设。这就需要比较两种不同来源的图像,以此纠偏这一错误认知。

在传统绘画过程之中,人们以手为媒介进行绘画创作,图画的内容是以人的视觉器官为基础,是对客观的场景进行主观性的模仿所形成的二维平面。而技术图像是人们借助人的延伸(技术性工具,如照相机等)对客观场景进行完全客观性的再现。技术图像的成像不是通过人的视觉而主观地成像,而是通过机器之眼,客观地、原封不动地对对象(场面)进行的再现。传统图像(绘画)是人利用主观对客观的再现,而技术图像则是人依从于技术装置,在理论(装置运行原理)的指导下,在限定的规则下客观地创造,如电影图像以及电视节目的构成。但是,先于这些视觉图像形成的是文本,依据文本内容技术图像才得以被创作出来。其间隐含着工具——运行者,即导演、制作人、演员等。如果人们不理解工具——运行者依据文本进行技术图像创作的符号化过程,那就无法真正地理解技术图像本质。

没有认识到技术图像的本源在于文字符号是导致后文字文盲普遍化的成因所在。技术图像符号的出现,解决了文字文本时代由于过度的工具理性的支配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以及文化危机状况,从而实现了人类传播的新发展。但是,由于图像泛滥,各种仿象与拟象等没有原件(original)的复制物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人与图像的关系。正如本雅明通过气韵(aura)的消失,指出了主体与对象艺术作品之间关系的改变一样^[20]。传统时代,人们通过观照(静观)的方式,主体与客观对象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人们通过屏气凝神的方式去感受艺术作品的本真与独一无二特性。但是,在以电子照片以及电影媒介为代表的机械复制时代,主体与对象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由于技术性文本、工具-运行者的隐藏,使主体认知受到了遮蔽。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照片与传统的绘画

并无二致。人们无法认识到自身已经自动地、无意识地随着图像洪水的到来而进入到后历史时期。由此,弗卢塞尔所说的技术图像所产生的后文字文盲现象出现了,他认识到了图像洪水的背后真正发挥本质作用的是技术性文本符号(文字符号),并指出在被图像所符号化的世界之中,随着后文字文盲的逐渐普遍化,能受到写作训练的也只有少数专家了。比如,现在普遍流行的视频社交类平台——哔哩哔哩视频平台上,包括书写能力养成之前的儿童,以及其他所有的年龄层的人们,都被吸纳进“工具-运行者”这一复合体之中,在以互联网媒介所形成的万众普遍参与的数字化游戏之中,参与者们正在迅速地被后文字文盲化,并使认知主体产生认知障碍。

四、文化危机的催生:认知失真的后果

技术图像登场以来,视觉媒介借助复制技术使图像以洪水之势,在全球进行传播从而引发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后文字文盲的加速化。人类利用各种视觉媒介参与到图像(影像)的世界建构之中,如短视频传播的流行,各种图像(影像)以几何倍数增长,共同建构了一个技术图像的宇宙。所以如今,不是人们使用媒介,并使媒介附属人类社会,而是人们生活在媒介所编织的象征性世界之中。过去的图像是存在于世界之中,但是现今的世界是存在于媒介之中。换言之,在技术图像符号的世界中,不同于文字符号时代无法解读文本的文字性文盲,技术图像时代的文盲面临一种新的认知失真现象——无法正确解读图像。生活于融媒体时代的人们由于无法对技术图像正确认知,而沉溺于日用而不自知的局面,极易造成新异化的生成,从而导致文化危机的产生。下面从主体能力、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图像意识形态等问题对认知失真的后果进行分析。

(一) 认知失真妨碍自律性主体的建构

主体性的问题指的是自律的主体还是他律的主体问题。在影像符号的包围之下媒介的使用者成为他律的存在。在电视时代,电视媒介构建的图像通过单方向的、持续不断的信息传达不但将人变成被动性的存在,而且使人成为丧失自由的消费者。在融媒体时代,图像(影像)的泛滥,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由使用者分享了大量的视频信息,更甚之,算法功能的强大,能够使人完全沉浸在精准分发的内容物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眼

球经济”的功能。各大网络直播平台的“网红带货”以“网红效应”推动“粉丝经济”的发展。这也体现了互联网演化逻辑的升级,即从原来的信息互联网升级为如今的价值互联网。但是,这种一味以经济价值为导向的信息价值观造成的往往是资本的“转换”^{[21][207]},也就是说,“网红”们积极地从以“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建构自己的物质财富,忽视了社会信任的建构,导致了象征性资本的变质。除了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技术性信任之外,还可以依靠自身本体性的属性,如人格魅力,来建构“象征性资本”。但是认知失真的加速造成整个社会沉浸于媒介技术所建构的景观社会的图像欺瞒中,人们成为以技术媒介为中心的他律性存在而不自知。

(二) 认知失真加剧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

技术图像符号强化了虚拟现实的建构,并且在融媒体时代,技术图像符号其所指的意义已经无甚重要,其能指的功能部分逐渐独立,建构了比实际现实更加强大的虚拟现实,并使媒介的使用者沉浸其中而不自知。因此,与其说在融媒体时代人们区分虚拟与现实的能力丧失,不如说虚拟现实扩张了现实的维度,而实在的现实只不过成为现实的维度之一而已。媒介使用者认知的失真加速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这体现了艺术对现实的模仿,远不如现实对艺术的模仿。而在融媒体时代,人们的生活仿佛更加是一种“映像”,而且是一种虚拟化的“映像”。特别是随着认知失真的加速化,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不断地实现对艺术的模仿,一方面加速了人的普遍美学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人的社会性的丧失,从而造成文化危机的产生。

在融媒体时代,通过数字媒介进行虚拟化交流拓展了现实的维度,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边界逐渐消散。不但在物理空间中人的感觉器官得以延伸,实现感官的再平衡;在意义空间中,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亦将彻底模糊。社交媒体所引发的媒介依赖,不但作用于虚拟空间的媒介使用者,对现实空间的人亦将发挥影响作用。所以,媒介沉浸与认知失真间呈现双向互动的关系,换言之,媒介沉浸加速认知失真,认知失真进一步加速媒介沉浸的发生。

(三) 认知失真进一步彰显图像的意识形态控制力

在技术图像符号所建构的世界之中,人们的意识形态受到图像意识形态的影响。图像所描写

的不是客观性先验存在的客观世界,而是人们利用符号所创造(建构)的世界的图景。今天的图像会成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并且大量存在的图像会对事件的因果关系或者说世界的相关关系进行简单化的处理,其展现的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表现的存在,这便使人类主体成为感觉性的存在,即人们容易被情感裹挟。与文字时代的理性传播不同,以互联网媒介为中心的技术图像符号的传播,是感性的、碎片化的,并具有刺激性与煽动性。这是因为传统的文字理性时代的传播方式为“动宾式”关系的逻辑形式,而融媒体时代“动宾式”的逻辑关系被抛弃,动词也就是谓语被隐藏起来,仅仅以外观上的真实来对受众(消费者)进行欺瞒。特别是没有谓语的新闻,由于受众并不能直接去现场了解新闻是否真实,所以只能凭感觉相信新闻报道的内容,相信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这是“知、信、行”三者关系博弈的结果。如果说文字时代认知与实践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知-信-行”,那么技术媒介时代认知与实践的关系则表现为“信-行-知”。因为信息无远弗届,媒介技术的迅速迭代升级,带来了时空的碎片化以及人阅读习惯的碎片化,主体自知自觉能力培养的深度阅读能力逐渐弱化,顺应、从众、无思考、感官刺激为主的碎片化阅读则促进了他律性主体的生成。于是体认(知识)、信念(态度)、实践(行为)的理性能力逐渐让步于信念、体认、实践的感性能力。换言之,生活在技术图像所建构的世界中,存在于人的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博弈的过程之中,感性地体验客观世界的的能力逐渐上升,人们往往在主观性地选择相信图像符号建构真实的基础之上,去认识并对客体对象展开实践,呈现人的本质性力量。然而,消费主义时代图像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则可能更加容易地被政治或经济的背后推手从中“作梗”,消解人们理性认知的能力,反而强化其感性信任的主观感受力,从而使认知失真进一步深化。

五、再启蒙:对认知失真纠偏的启示

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启蒙”的出现重新确立了人的位置,从而打破了神对人的支配,进而确立了文字理性的支配地位。文字理性的不断扩张造成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以及文字的过度抽象化,从而使技术图像的出现有了正当性。如果说印刷媒介的普遍使用是对文字文盲的清除,那么

如今融媒体时代对后文字文盲的纠偏则需要进行再启蒙。

(一)重新认知技术图像

技术图像符号所建构的文化,特别是以互联网媒介为中心所建构的新的视觉文化,体现人、媒介、环境之间关系的嬗变。作为中介的媒介在人与对象世界之中起到“桥梁”的作用之时,便会造就文化的昌盛,当起到“深渊(障碍)”的作用之时,便会产生人的异化,导致文化的危机。而从媒介迭代的历史来看,从传统的文字符号到技术图像的迭代转变过程之中,把握媒介本质不在于对媒介本体进行孤立地解读,而是从人与媒介的关系中去认知媒介,也就是说,从媒介现象学的视角去认知媒介,将媒介现象学作为一种认知的方法。媒介现象学的方法在于考察媒介对人呈现了什么,以及人对媒介的呈现如何认知。也就是说,基于媒介的呈现,考察媒介与人认知的关系。那么媒介是什么就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如何认知媒介。首先,媒介是一种人造物,是人类创造能力的体现,图像媒介的发明,在于人类通过人工的创造来赋予人生以意义,这并非一种自然行为,而是反抗自然,建构“人文”的反自然行为。其次,人为创造的图像历经对现实(实际)的再现,到对概念的“再编码”过程。也就是说,传统图像是将实际之物消除“时间”与“深度”,变成二维的平面(如图画),如今的技术图像本源则是概念(文本),是将线性的文本粉碎为零维的“点”,然后从无维之境再创造二维的图像,这是一个组合的过程。例如,不论是电影还是短视频都源于文本“剧本”,是将文本进行再符号化,变成图像(这里的图像是点的组合);再如,红色交通信号灯的本质也是其背后的概念而非颜色——发挥作用的是闯红灯要付出相应代价的命令文本。所以,在技术图像时代,真正看透图像本质的人在于认识到自身需要同时具有文字的解读能力,以及与技术图像相适应的新认知能力,如碎片化的阅读能力,认为图像是不需要学习就能认知的想法本身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技术图像时代的媒介认知是技术图像解读能力不仅包含碎片化图像表象认知能力,也包含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字书写能力,否则就是一种认知的失真。而失真纠偏的方法,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明确正确使用媒介的方法,二是重新像文字习得的小学生们一样,开始对图像认知进行学习。

(二)明确如何使用媒介的重要性

认知与实践的关键在于媒介的使用者如何去使用媒介。具体而言,一是在对媒介的本质没有认知的情况下,全盘地接受娱乐化的、感性的信息;二是能够在理性的认知之后,有选择地去欣赏、参与娱乐化的、感性化的内容。正如,麦克卢汉的冷媒介和热媒介的区分是在于人们参与的程度^{[22]35-37}。凡是具有对话性的都属于冷媒介,需要人们更高的参与性;凡是信息单方面传播的,互动性低的媒介便是热媒介。这与弗卢塞尔对话语式媒介和对话式媒介的认知标准是一致的。但是,弗卢塞尔认为对话式和话语式媒介的属性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16]214}。比如,电影作为单方向话语传达的话语式媒介,当人们向银幕投掷鸡蛋之时,其属性便会变成信息双向交流的对话式媒介;公园本是提供交流、对话的对话式媒介,但是成为讲座的场地之后,其性质便由对话式媒介转换成话语式媒介。所以在融媒体时代,作为互动的社交媒体平台,如果仅仅被裹挟在影像的洪水之中,被动地、持续地被观看,那么社交平台交流的双向性并没有体现出来,依旧如传统单方向信息传播一样。由此可见,对融媒体时代认知失真的纠偏关键在于人们明确如何使用媒介。

(三)回归原初的学习力进行技术祛魅

技术图像时代就应该有符合图像时代的读图能力。传统图像是对现实的再现,是将现实抽象化为二维的平面,而技术图像是对概念的再编码,是将一维的文本抽象化为无维的点,进而将点组合成新的二维平面,也就是说,新的图像与传统图像不同,它是点的组合,这不是一个抽象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具象的生成过程。这就符合本雅明提出的不同的媒介时代应该具有不同的认知任务——传统的艺术作品可以通过观照(静观)的方式进行体验,但是电影这种技术图像符号所建构的艺术产品,是通过分散性的震惊的方式才能够体验^[20]。这符合现象学对主体与现象关系的认知,因为图像与观赏者二者其一发生了变化,那么二者的相关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并且,传统时代是人来接近图像,而技术图像时代是图像来接近人,人完全沉浸在图像符号所构建的世界之中,随着画面的流动而流动。在融媒体时代,抖音短视频平台的影像产品,通过“算法”机制进行精准分发,准确地定位受众的兴趣点,甚至形成所谓的

“茧房效应”,使其完全沉溺于视频所构建的世界之中。受众听之任之,则沉溺于抖音而无法自拔,而对“抖音祛魅”则需要认清其生发机制,使启蒙持续进行。所以,对于融媒体时代的媒介使用者来说,防范认知失真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回归“原初”的学习力,进行再启蒙(自我启蒙),从而对技术祛魅。其原因在于,技术图像时代的媒介使用者已经获得媒介的赋权,能够参与到媒介化的生活中,那么自然也具备通过媒介实现自我启蒙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张成良. 融媒体传播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 [2] 喻国明, 耿晓梦. 元宇宙: 媒介化社会的未来生态图景[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
- [3]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 张新木,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4] 李曦珍. 理解麦克卢汉: 当代西方媒介技术哲学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5] 周海宁. 基于移动短视频传播的文化转向与信息价值观的重构[J]. 东南传播, 2019(10).
- [6] Petra H, Geertjan O, Daniel B, et al. A Meta-Analysis on Cognitive Distortions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J]. Criminal Justice & Behavior, 2014(3).
- [7] 约翰·迪米克. 媒介竞争与共存: 生态位理论[M]. 王春枝,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 [8] 柯缙祖. 网络舆论特点研究[J]. 红旗文稿, 2011(15).
- [9] 李艳玲. 扣准社会脉搏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前提[J]. 求是, 2013(2).
- [10] 李存义. 为好声音喝彩, 为正能量点赞[N]. 人民日报, 2014-10-28(5).
- [11] 华炜. 社会认知方式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J].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 2012(12).
- [12] 詹姆斯·W 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 “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修订版)[C]. 丁未,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 [13] 周海宁. 以互联网媒介为中心的听觉文化转向以及构建[J]. 出版发行研究, 2019(7).
- [14] 威廉·弗卢塞尔. 摄影的哲学思考[M]. 毛卫东, 丁君君, 译.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7.
- [15] 周宪. 视觉文化的转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6] 威廉·弗卢塞尔. 传播学: 历史、理论与哲学[M]. 周海宁,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

[17] 威廉·弗卢塞尔. 表象的礼赞: 媒介现象学[M]. 周海宁,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3.

[18] 周海宁. 互联网时代中国媒介文化的嬗变以及人的主体性重构[M]. 延边: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9.

[19] 尼尔·波兹曼. 童年的消逝[M]. 吴燕蕊,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0] 周海宁. 从本雅明提出的 aura(气韵) 媒介观看对象与主体关系的演化[J]. 新闻传播, 2018(21).

[21] 皮埃尔·布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2]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Research into Cognitive Distortion of Technical Image Symbols in the Age of Convergence Media

ZHANG He¹, ZHOU Haining²

(1. School of Litera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2.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In the age of convergence media,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 and renewal of media technology, technical image symbols have become the dominant media ones, the popularization of which has not only deeply affected people's modes of cognition and lifestyle, but has also given rise to a new phenomenon: cognitive distortion, that is, distortion of people's perception of reality. In today's mediated society, this phenomenon is manifested as a new-type "illiteracy" that is distinct from traditional literal illiteracy, and this is a phenomenon of post-literal illiteracy. Specifically, the main manifestation of cognitive distortion is that the obstructing function of images is too prominent and people immerse themselves in an image-constructed world without being aware of it. The reason for cognitive distortion mainly lies in people'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technical images and the inability to recognize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brought about by different media.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distortion are multifaceted with it hind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utonomous subjects, blurr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and reinforcing the control force of image ideology. Therefore, we need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ognitive distortion, understand and perceive technical images again, clarify how to use media correctly, and return to our original learning abilities. Only by doing so, can we better adapt to this image-dominated world and avoid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cognitive distortion.

Key words: technical image symbol; cognitive distortion; post-illiteracy

(责任编辑 合 壹, 实习编辑 郑安然)